

宋朝表牋總類卷第七

明堂 裕亨

蕭泰芳

董國炎

主編

# 文獻研究

第1輯

九思人顧廷龍題

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425.1  
X340  
:1

# 文献研究

第一辑

主编 萧泰芳 董国炎

编委 萧泰芳 董国炎 李 豫

牛贵琥 白 平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献研究 第1辑/萧泰芳, 董国炎主编. —北京: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 1999.6

ISBN 7-5013-1589-2

I. 文… ①萧… ②董… III. 古籍-研究-中国 IV. G25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7287 号

书名 文献研究 第一辑  
著者 萧泰芳 董国炎 主编

---

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(原书目文献出版社)  
发行 (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)  
经销 新华书店  
印刷 北京双桥咸宁侯印刷厂

---

开本 850 × 1168 (毫米) 1/32  
印张 12  
字数 290 (千字)  
版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 1—1000

---

书号 ISBN 7-5013-1589-2/K·289  
定价 18.00 元

仲尼撰古史  
祀宋不遠微  
又獻是凭借  
情真事理明

姚奠中題



兵民陽安

通說

[illegible]

安阳县民兵 1955 年中秋节日号

[illegible]

四

[illegible]

# 试论校雠学与小学的关系（代序）

董国炎

校雠学与小学，均前人惯用名称。今人对这两个名称，特别是校雠学，可能只有比较笼统模糊的理解。本文企图回顾二者的历史发展情况，说明二者有互补关系，对校雠学，拟给予更多的注意。

这种撰写计划的原因何在呢？在于笔者感到，在二者关系中，当今存在重视小学，轻视校雠学的倾向；二者存在互补关系，也乏人注意，这显然不利于文献学的发展。

按当今学科分野，校雠学归于文献学领域，而小学，既归于文献学，又归于古代汉语或曰汉语史学科，有一身二任的独特性。小学所含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三大部分，构成了古汉语学科的主干。清代学者在小学领域有非凡功力和骄人成绩，令人满怀敬慕之情。至于校雠，人们可能认为，不过是校勘或者校对而已，大概很难以此名家。

在有关刊物上发表的小学研究论文，数量甚多，而研究校雠学的论文，数量极少。笔者统计了1993年至199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，可以归于小学的研究项目较多，而能够归于校雠学的项目，几乎没有。笔者了解

过部分省市的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，校雠学项目，基本是空白。

上述现象，反映了校雠学研究未能得到应有重视。这种倾向，肯定会影响古籍整理水平。当前一些古籍整理成果，水平偏低，辗转炒冷饭，只在外观上变花样，下功夫，对古籍本身的整理成绩甚微。其中校勘方面，错乱严重，或者有名无实，不是偶然的。此外，校雠学与小学之间，具有内在联系、互补关系。校雠学水平不能提高，不能发现问题，不能从目录、版本、编纂、辑佚、辨伪等方面分析问题，必然影响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。

本文拟对校雠学以及小学的历史作些回顾，当然是为了深化认识。限于水平，可能只及于皮毛，但抛砖引玉的初衷，愿得到理解和帮助。

# —

小学之称，缘于周代为上层贵族子弟所设的学校。这种学校以传授六艺为务，读书写字和简单的解释，是教育内容之一。黄侃所述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引《周礼》《大戴礼》《白虎通》等典籍，说明“八岁入小学，十五岁入大学，则古之所谓小学者，自名其舍曰学，固非今日之所谓小学也。今之所谓小学者，则中国文字、声韵、训诂之学也，许氏所谓六书也。以其繁而难举，故以教六书之学名之。”

为什么后来认为繁难深奥的学问，周代却在八岁童

子即入的学校里传授呢？这就是语言文字发展变化造成的问题，后人读前代文献，很容易发生阅读理解障碍，随之即要求正确解释其形音义。汉代去周代已较远，文字由金文、篆书变为隶书，语音已有今音、古音问题，经今古文学派之分随之产生。古文学派的特点就是以小学入手治经学。就小学本身的性质而言，仍然是工具的性质。

校雠学的兴盛，也是在汉代。先秦典籍传至汉代，本应整理。而秦火之后，典籍散佚错乱严重，这都是大规模整理典籍的客观要求。另一方面，经学今古文学派的分歧也逐渐加深，各按自己的观点解释经典，这也形成整理典籍的客观要求。汉成帝时，朝廷组织整理典籍，规模空前。“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、诸子、诗赋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，太史令尹咸校数术，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。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·总序》）

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条理的校书活动。当时诏令和后世文献，称此为“校书”，而“校”的本义，实在简单。刘向《别录》说：“雠校，一人读书，校其上下，得谬误为校。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，若怨家相对，故曰雠也。”则独校为校，对校为雠而已。然而整个校书工作，却复杂得多。由不同专长的行家分校群书，关系到书籍的分类。刘向因校书有收获，著成《七录》，此书影响其子刘歆的《七略》。班固《汉书》又删改《七略》而成《艺文志》。《艺文志》先分六略，每略下又分若干家或若干种。例如“诸子略”下分儒、道、阴阳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、杂、农、小说十家，每家下面再著录作品。这种分



类，是学术门类划分，也是思想派别分野，对中国文化史关系很大。

实际上，校书之前还有一个前期工作，即征集遗书。这一工作是朝廷安排，“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”。（《汉书·艺文志·总序》）这样，征得的书籍五花八门，同一种书有不同传写本，给下一步的校书活动带来麻烦，但我们发现，刘向利用这个条件，广储副本，提高了校勘质量。刘向为每书所写叙录记载了所用副本之多，因而能够订正脱简、脱字、误字、异字，除去重复。章学诚《校雠通义》就刘向校书这一特点总结经验说：“夫博求诸本，乃得雠正一书，则因得广储以待质也。”

专人校书结束之后，再由刘向总其成，“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”。（《汉书·艺文志·总序》）“若刘向校书，辄为一录，论其指归，辨其讹误，随竟奏上。”（阮孝绪《七录序》）这两条记载，涉及了三个方面的工作。

第一，编目，即所谓条其篇目。这种编目，相当复杂，含有大量分类工作。如刘向分管的“诸子略”中，十家的划分，特别名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小说家等等，难以区分准确。直至明代胡应麟，仍然议论杂家小说家区分之难。刘向、刘歆至班固，以互著之法解决这一难题。兼有两类性质的书籍，分别著录于两类之中。由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可以看到这种处理的实例。这样处理，符合古代典籍的实际情况。

编目工作还包括书名的确定，各篇的顺序安排。后代仍有部分文献存在这种需要。刘向处理这种文献，一定程

度上决定了该文献的命运。如《战国策》原书，各篇混乱错杂，书名则国策、国事、事语、短长、长书、修书，驳杂不一。刘向删去重复错杂，整理为三十三篇，裁定书名为《战国策》，才成为一部名著。

第二，提要，即所谓撮其指意，论其指归。这种工作也即题解工作，涉及内容很广，比较自由，但又有基本限定。主要包括作者介绍或考证，作品的基本旨趣及考订、评论。也包括作品思想源流，作品流传经过，版本情况等。思想内容方面可为读者提要引路，文献价值方面具有“小史”性质。在中国目录学范畴开创叙录提要之先河。

第三，辨伪删汰，即辨其讹误的工作。既有全书的辨伪，也有部分内容的辨识错误，可能含有一定删裁。这类工作很有价值，至于具体辨识删裁得当与否，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而论。

以上工作，实际包括校勘、辑佚、考订、辨伪、编纂、目录、版本、提要等等多方面内容。这些工作得以进行和完成，都依托校书。后人遂概括而称之为校雠。由刘向《七录》刘歆《七略》到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影响历代公私著述，形成传统和专门学问，被称之为校雠之学。在校雠学发展和理论建设方面，最值得提及的是宋人郑樵和清人章学诚。

郑樵《通志》列著名“三通”之一。《通志》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二十略，二十略相当于二十种贯通古今的专门史，其中有郑樵归纳总结而提出的新的专史，也可称之为“新学科”。就细部而言，二十略中不乏需要推敲加工

之处，但总体上讲，却胆识气魄非凡，价值非凡。传统史学，侧重于个人，尤侧重帝王将相，而且等级分明。本纪、世家、列传之体，历二千年之久，只不过形式上去掉世家，实际编排上仍存。后人愤慨地评之曰：为帝王将相作家谱。专门史虽非郑樵开创，但郑樵在规模上扩展，体例方法上开创。他曾明言自己著作的眼光体例之独特：“虽曰继马迁之作，凡例殊途，经纬异制，自有成法，不蹈前修。观《春秋地名》则樵之《地理志》异乎诸史之《地理》；观《群书会记》，则樵之《艺文志》，异乎诸史之《艺文》……观《图书志》《集古系时录》《校讎备论》则知樵校讎之集，于刘向、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。”（《上宰相书》）

二十略值得称道，其中在自然科学和文化史方面的开创确如章学诚所评论：“卓识名理，独见别裁，古人不能任其先声，后代不能出其规范”。（《文史通义·释道》）校讎学列入二十略，至今值得我们深思，值得我们认识这门学问的价值。校讎是文化保存、文化继承、文化传播方面最重要最实在的环节。有人以为这只是些编排技术和校对技术，图书馆编目室和出版社校对室专司其职，我辈小学专家无须一顾。这种思想显然不利于文献学的发展。

郑樵校讎学对刘向父子有继承有发展。其特点是特别重视分类，重视源流，重视辑佚，重视真伪。因此提出：“学术之苟且，由源流之不分。书籍之散亡，由编次之无纪。”（《通志·总序》）“书之不明者，为类例之不分也。”（《通志·校讎略》）他所细分类例，未必尽皆妥当，但在总纲细目组合的基础上，细而不乱，有经有纬，胜于庞然

无统。考辨源流，寻找脉络，是由学术史统带目录学，学术源流和发展演变直接联系文献著录。这同撰写提要论其指归一样，都是中国校讎学特别富于学术气的表现。郑樵重视辑佚，提出很多辑佚途径，坚持目录学必须著录亡佚之书。《校讎略》有“编次必记亡书论”。他喜欢考订真伪，虽然难免考证错误，但开考据风气，影响较大。

章学诚阐扬校讎学理论，总结得失经验，著有《校讎通义》专书。有人怀疑《校讎通义》不过是《文史通义》的一部分，章学诚去世后，编集遗书时未能编入《文史通义》。但我们认为：既然《章氏遗书》的两种版本，嘉业堂本和大梁本都是分列二书，而嘉业堂本是由章氏好友编成，大梁本是由章氏之子编成，就应当相信《校讎通义》单独成书符合章氏本人意愿。至于《文史通义》中有些校讎学内容，这是学者著述中常有现象。我们不必怀疑《校讎通义》这部专书的性质。

章学诚继承了刘向、刘歆、郑樵的传统，使校讎学更加理论化、系统化。他不像郑樵那样自负，他对校讎学前代学人，对学术得失的议论，更加平实公允。他对校讎学的总体看法，与刘氏父子及郑樵一脉相承。《校讎通义》说：“校讎之义，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，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。非深明于道术精微、群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与此。后世部次甲乙、纪录经史者，代有其人，而求能推阐大义，条别学术异同，使人由委溯源，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，千百之中，不十一焉。”所谓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即对学术分类，学术流变，学术渊源的把握。这是依托校讎

而形成的中国文献学传统。对校雠学一系列具体问题，章学诚总结前人经验，提出对应办法。例如校勘方面，他主张广储副本，编制索引，详写校记，不明晰的问题、有疑难的问题存疑，聘请专门人才校对专书，等等。这些主张，不但合理，大都可行。

正是在高度重视校雠，不断继承前人，又不断创新发展，不断完善理论和技术的情况下，中国校雠学才形成一套完整又富于活力的体系。

## 二

校雠学与小学的关系，似乎不甚为人留意。实际上，小学方面的成就，往往要依赖校雠配合。后人崇敬清代朴学大师，犹如清代学者崇敬许郑贾马。清代朴学大师治学，往往依赖校雠的情形，不可视而无睹。

阎若璩《古文尚书疏证》，辨伪破惑，解开千年迷雾，才高胆大，眼光如炬，是清代朴学代表作之一。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记述阎若璩获得这一成就的过程，颇有启迪价值。长期流传于世的古文《尚书》，真伪引起后人怀疑，但一直无人能证实其伪。阎若璩《疏证》列举一百多条证据，全方位论证了古文《尚书》之伪，使此事成为定论。他的论证中，发现问题，证实问题，多凭借仔细校读。选择有价值有权威有说服力的版本、遗文进行对校。如以汉人郑玄所注《尚书》、以汉人蔡邕石经残碑遗字为参照标准，来校所谓孔安国古文《尚书》。“以今孔书校之，不同者甚多

……然后知晚出之书，盖不古不今，非伏非孔，别为一家之学也。”（《汉学师承记》）

阎若璩又选择多种权威文献，进行理校性质的校勘。“今以《史记》《说文》与晚出书相校，又甚不合。”（《汉学师承记》）

对古文《尚书》中一些比较特殊比较可疑的用语，选择魏晋人所著文献相校，“乃知此时，自有此等语，则此书之出魏晋间，又一佐也。”（《汉学师承记》）

伪古文《尚书》在郡县建制的时间方面、河流变化的时间方面，常露出马脚。打着汉武帝时人孔安国的旗号，却写进了东汉以后才有的情况。恰好证明这些文字不可能出于孔安国之手。有的地名使用错误，由于时间更接近，容易被忽略，经仔细考辨，仍可证明作伪。如“金城郡，昭帝所置。安国卒于武帝时，而传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，岂非后人作伪之证乎？”（《汉学师承记》）这类错误的辨识，道理上讲并不深奥，但尽管怀疑此书者颇有人在，却长期乏人揭明这类错误，或者提到而不能说透彻。这是因为，揭明这类错误，需要地理、历史、典章、制度方面的足够修养，还需要仔细校读，才能发现别人不易发现的错误。

古文《尚书》真伪之辨，说明校讎对考据的重要价值。高邮王氏的成就，则说明校讎对小学、经学、诸子学研究的重要价值。王念孙是乾嘉朴学代表人物之一，其《广雅疏证》享誉学林，是乾嘉时代训诂学研究的力作。王念孙的自序很能说明治学方法：“盖是书之讹误久矣。今据耳

目所及，旁考诸书，以校此本。凡字之讹者五百八十，脱者四百九十，衍者三十九，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，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，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，复随条补正，详举所由。”能够发现如此之多的讹、脱、衍、错、误，依赖认真细致刻苦繁复的雠校，也依赖雠校方面的经验和判断力，才能够发现问题，判定性质。随条补正，详举所由，主要依赖文字音韵训诂考据方面的功力。功力不够，无法解决问题。王念孙对自己的功力，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，并不多谈。这是大学者的谦虚态度。他对自己搜求的版本，发现的问题，则乐于详举，其实不无自得之情。有功力的学者之间，谁能够首先发现问题，谁就可能首先解决问题。他发现问题的办法，就是校雠之学。

具体说来，怎样利用校雠之学发现问题，乃至解决部分问题呢？王念孙在另一力作《读书杂志》中多所述及。书中多篇小序均首先论其版本源流，版本优劣，论及自己搜求版本的经过。他并非藏书家，留意版本目的不在收藏，而在研究价值，因此特别留意其他学者校勘过的精本，借鉴其成果，以完成更精良之本。这种留意各书整理动态，留意并借鉴其他学者成果的精神状态，至老不衰。如《晏子春秋》一书，经几位学者不断努力，校本质量不断提高。顾广圻校本后出最佳，顾氏赠送王念孙。王念孙说：“时予年八十矣，以得观为幸。因复合诸本，及《群书治要》诸书所引，详为校正。”（《晏子春秋·杂志序》）再如《荀子》一书，王念孙的《荀子杂志》已经付刊之后，又得到顾广圻抄录的版本异同新材料。“余乃知吕本有刻

本、影抄本之不同，钱本亦有二本，不但钱与吕字句多有不同，即同是吕本，同是钱本，而亦不能尽同。择善而从，诚不可以已也。时《荀子杂志》已付梓，不及追改，乃因顾文学所录，而前此未见者，为《补遗》一篇，并以顾文学所考订及余近月所校诸条载于其中，以质于好古之士云。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邮王念孙叙，时年八十有七。”（《荀子杂志补遗序》）如此高龄，仍孜孜追求不息，择善而从，精益求精。其精神足为中国文献学增添异彩。

乾嘉诸儒在对校、本校、他校、理校的运用上，一般都能综合运用，针对具体情况，重点运用某种方法。然而各位学者性情学养不同，有人自信、大胆，有人则比较谨慎。有人多用理校，有人多用对校。有人勇于改动古书，有人则否。因此产生过分歧和争论。段玉裁和顾广圻围绕《礼记·王制》的校勘发生争论，持续很长时间且深化到校勘方法的规律把握。段玉裁《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》说：“校书之难，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，定其是非之难。是非有二：曰底本之是非，曰立说之是非。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，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也。”

“何谓底本？著书者之稿本是也。何谓立说？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。”

“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，则多诬古人；不断其立说之是非，则多误今人。”

所谓立说之是非，是对作者观点的评价。若对作者观点持否定评价，就是批判其观点，也即驳其立说。现在看来，这已超出校雠范围。而定底本之是非，则属于校雠范



围，但是难度很大。段玉裁、顾广圻这样优秀的学者，才围绕一些具体问题，激烈争论。然而底本是非，毕竟无法绕开。梁启超曾谈过这一工作的价值：

“盖吾辈不治一学则已，既治一学，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，了解明确，第二步乃批评其是非得失。譬如今日，欲批评欧人某家之学说，若仅凭拙劣伪谬之译本，相与辩争讨论，实则所驳斥者乃并非原著，如此岂不可怜可笑！研究中国古书，虽不至差违如此其甚，然以语法古今之不同，与写刻传袭之讹错，读之而不能通其文句者则甚多矣。对于未通文句之书，而批评其义理之是非，则批评必多枉用，此无可逃避也。清代之考证学家，即对于此第一步工夫而非常努力，且其所努力皆不虚，确能使我辈生其后者，得省却无限精力，而用之以从事于第二步。”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）

要之，定底本之是非，价值很高，难度也很大。探讨“定是非”之规律，就是非常重要的。王念孙等人对此用力颇勤。王念孙《淮南内篇杂志后序》总结这种规律六十多条。在整个《读书杂志》八十二卷中，《淮南内篇杂志》占二十二卷，校勘实例最多，或者说校勘收获最大，便于从中总结规律。这些规律中，一部分针对校讎中常见现象作总结，一部分属于怎样利用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知识来判断是非。例如：有因字不习见而误者，有因假借之字而误者，有因古字而误者，有因隶书而误者，有因草书而误者，有因俗书而误者，有不审文义而妄改者，有因字不习见而妄改者，有不识假借之字而妄改者，有不审文义而